



復旦大學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书系

水流花开

——
经典形塑与文本阐释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陈尚君 主编



中西書局



復旦大學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书系

水流花开

——经典形塑与文本阐释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陈尚君 主编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流花开：经典形塑与文本阐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陈尚君主编. —上海：中西书局，2019.12
ISBN 978-7-5475-1671-3

I. ①水…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7035号

水流花开

——经典形塑与文本阐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陈尚君 主编

责任编辑 王宇海
装帧设计 黄 骏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邮编200040)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450 000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671-3/I·202
定 价 10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021-64709974

前 言

2017年12月1日至4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经典形塑与文本阐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多功能厅举办,参会学者八十三人,收到学术论文七十五篇。会议讨论热烈,交流充分,开得很成功。会后,与会学者根据讨论意见,重新修订定稿,我们选取二十二篇,结集为本论文集。

近几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究成绩巨大,变化显著,其中最重大的成就,我认为是文献建设、视野开拓与方法变化,从单纯的作家作品研究,进而全方位地关注一个时代文学风气的变化及其内外原因,关注伟大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文化联系,关注文学群体的共同追求及其内部差异,关注文学作品的文体变化及其细节讲求,关注文学内容与形式变化的互动协调,关注文学传播中的文本变化与事实偏移,关注文学批评的多元展开及其对文学风气变化的推动引导,关注外来元素对中华本土文学产生的冲击与位移,关注长期被忽略的中小作家的文学业绩……还可以举出许多。我总是想到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变化从传统的以诗文为中心的选赏评点,转为与现代大学教育相联系的文学史教学传授,中间还有从苏联文学研究模式延续的以作家、作品论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经常会觉得研究的目的就是揭示古人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社会的多元转型,即便最古老的中国文学研究也发生根本变化。很长时间以来,就传统与现代、宏观与微观、议论与考据、文学与文化、文学与人性、文学与社会,有过许多热烈的讨论,似乎从来也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但也正是这些讨论使所有从业学者认识到,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开放的中国文学研究应该参考吸取人类文明至今所取得的所有成果,以多元的姿态展开各自的独到研究。社会环境与对外交流的变化,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充分而多元的表现舞台,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以我从事的唐代文学基本文献研究来说,最近四十年的成就,即便面对此前一千年研究之总和,也可说毫不逊色,更时见出蓝之色。其他方面,虽然我没有

能力一一加以描述,大体差不多,是可以想知的。

基于上述学术背景,许多学者呼吁学术研究回归大家、回归经典、回归作品,我们深表赞同。所谓大家,应该是站在时代巅峰的伟大作家,他们的成就也足以代表一个时代,并曾产生长远影响。所谓经典,可以是一部书,可以是一首诗,也可以是历史人物或艺术形象,其最重要特征应该是曾广泛传播,家喻户晓,久曾传诵,并产生重大影响。那么问题来了,从古到今,作家可数者当不下数十万人,存世作品数量更为巨大,然而能成为经典作家或经典作品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往更深处观察,不难发现,经典作家及其作品,各个时代的认知会有很大的不同。以唐诗为例,今日家喻户晓的作品,比如李白《静夜思》、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杜牧《清明》,在唐宋时期很不为人所知,其进入大众视野其实主要在明清时期。唐人曾特别矜为经典的作品,晚近无人阅读者更不在少数。这是时代的差异,其实也与阅读人群的文化程度与理解能力有关。再加深究,唐人所著如《本事诗》《云溪友议》等书所载有名诗歌的有趣故事,如红叶题诗、司空见惯、破镜重圆、人面桃花等,似乎与史实很难合辙,更多出于以讹传讹的民间传闻。再如历史上的明君贤臣、忠臣烈女,乃至反面典型如隋炀帝、李林甫等,也与历史人物的真实作为有很大不同。可以相信,经典著作、经典作品、经典形象、经典作家,每一个个案都有其特殊的发展变化轨辙,是在各种不同社会环境和阅读人群中,主动或被动地被重新包装改写,重新阐释,从而完成各自独特的经典化过程。对这些过程分别加以探讨,也有助于我们对这些经典的重新梳理和认识。

上述见解,有幸得到许多学者的理解与赞同,并从各自研究领域给以呼应,提交学术论文参与讨论。本书所收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能展示全貌。但各家所言,皆依凭有据,论证精密,评说宏通,见解独到,各有创获,读者当不难体会。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到明年恰巧二十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一些成绩,也始终在向其他兄弟院校学习看齐,寻找差距,努力前行。我们看到,中国学术处在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各个领域、各种流派的研究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稍有停顿,就会落后,即便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样最传统而基础的学科也是如此。我们会不断督励进取,也希望中外同道不时给以指点与帮助。

本书结集难免有疏漏处,敬请相关学者与读者给以及时指正。

陈尚君

2018年11月8日

目 录

《老子》文本形成与注疏诠释的语言机制·····	丁 亮	1
史学丑闻与文学经典：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演变和经典形成 ·····	王立群	30
谢灵运诗《发归濂三瀑布望两溪》中的“同枝条”一辨·····	李 静	45
不平衡的文体与备众体的文论·····	陈 特 陈引驰	60
从“诗”到“讖”：南北朝帝王诗歌的创作、传播与被建构 ——从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诗说起·····	李 猛	88
论六朝志怪小说里之孔门弟子·····	潘铭基	113
女皇的纠结 ——《升仙太子碑》的生成史及其政治内涵重探·····	唐 雯	136
寒山诗日本古注本与寒山诗的经典化·····	卞东波	161
“杜甫文不工”的形塑 ——典型与对偶的诗学·····	佐藤浩一	186
手批杜诗：杜诗经典化的重要一环·····	曾绍皇	203
《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	吴怀东	227
《文镜秘府论》经典形塑的过程·····	卢盛江	250
五代俗讲僧云辩的生平与作品·····	陈尚君	262
关于婺刻《三苏先生文粹》所载策论·····	朱 刚	273
《世说新语》在宋代的经典化 ——以诗歌用典为中心·····	罗 宁	283
严羽诗学著作的生成及其早期传播·····	陈广宏	313

复调的戏谑：《文房四友除授集》的形式创造与文学史意义	侯体健	341
明代元曲学的兴起		
——以元曲本的流变为中心	李舜华 陈妙丹	359
论服部南郭重新考订李攀龙《唐诗选》	顾春芳	381
“共抒天下公愤之气”		
——论明末清初时事剧中之当代书写与公众意识	王璆玲	397
近代学界的“李清照改嫁”之争	杨 焘	434
从数字化时代到数据库化时代		
——从哈佛大学的三大人文数据库说起	徐永明	442

《老子》文本形成与注疏诠释的语言机制

丁 亮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一、前言：语言操作的机制与意义

关于经典文本及其诠释,从文本形塑与诠释活动来看,在经典所论述的内容之外,还应从语用学的观点考虑语言在操作中的机制及此机制的意义。即一部有内涵、有深度的经典,其作者应当不只是清楚地知道他说了什么,而且应当还清楚地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并能掌握这么说的深刻意义。于是经典的意义就不只在它“说什么”,还在于它“怎么说”。如是,就“怎么说”而言,乃是将经典诠释的焦点从语义学的意义提升至语用学的意义,关注“说”的行动特质,“怎么说”其实就是怎么做,故其作用超越了“说什么”所能产生的影响,故此文本或文学的书写、阅读、诠释与体悟便不单纯是观念在心智中的理解,还包含着身体与生命情境的置入,最终涵养了自我。

是以本文将在“怎么说”的操作层面,而不在“说什么”的理解层面,阐明《老子》文本形成与注疏诠释的语言机制。这意味着本文对《老子》文本与诠释的讨论将以语言内部机制之运转为主,而不以《老子》思想及其诠释内容为主,并暂且略过有关文本在历史中的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的考量。甚至,在书写与诠释的操作下,解构《老子》文本具有固定思想内涵与唯一真解的观点,因为一本经典的思想内涵若是固定不变的,其诠释内容亦只能容许一种解释,那么,这本经典的诠释弹性便可能有限,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思想的人便可能难以适用于自身。而若在文本形成与注疏诠释操作的语言机制中便对内容的变换具有极大的适应弹性,甚或这种弹性变动本身就是此一操作机制存在的意义,以便去故就新,不断

在变动不居的崭新存在状态中涌现生意,解决问题,涵养自我,则对于《老子》思想固定内容的解构,实际上就是对于《老子》思想精神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本文尚要引入意大利学者贝蒂(Emilio Betti, 1890—1968)的诠释学观点,以解决经典文本与诠释间的合理关系。诠释由诠释对象与诠释者完成,贝蒂则在其名著《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中指出诠释对象与诠释者在诠释中均有应守的规律,从诠释对象的“整体规则”和“意义融贯性”来看,经典有其自身的特质与规律,而应被视为一内在融贯的整体来诠释,《老子》即是《老子》,与《论语》大不同,贝蒂从诠释的脉络将此说为“诠释学的对象自主性的规则”和“意义融贯性规则(整体规则)”,而且这种规则,无论是在一幅画、一首乐曲或一本书中,都是“富有意义的形式”,故而剖析《老子》文本,即是探索这个“统一”而“富有意义的形式”,后人的诠释,不应违背这些规则与形式;^①从诠释者的诠释立场看,则当注意“现实性规则”和“应用作用”,因为理解受限于诠释者现有的理解能力与动机,“我们心灵所获得的任何东西都进入了我们自己已经具有的我们表象和概念的整个结构之中”,而“信仰者共同体的实践活动需要这种具有可应用于道德问题的解释”。^②因此经典文本有其自主的语言机制与作用,诠释应当予以尊重,但诠释者亦有置身之立场与模式,诠释才有时代意义。于是透过诠释对象与诠释者两端,我们得以较为完整地掌握诠释活动。

具体讨论则将分成文本形成、文本阅读、注疏诠释与注疏体悟四节进行。首先,郭店简本、帛书甲乙本与北大汉简本《老子》的出土,配合传世各本,让本文得以在传统的校勘版本观点外,从版本比对中踏实地观察文本形成的规律,并在《老子》自述“正言若反”的原则下,掌握字句各种复杂的书写现象与统一的语言机制;其次,则进一步说明《老子》文本在阅读中所具有的“称代”效果。“正言若反”原则中隐匿的称代作用,得以在“作者隐身”与“自我对话”这两种特殊现象配合下,发挥到极致;再次,则继续阐明注疏诠释合理的语言机制。合理的诠释机制应与文本“正言若反”的书写机制一致,而在道物、有无、本末、一多、动静等譬喻机制的弹性下灌入注疏者处身之历史内涵,注疏者则可借此“现身”而展现解

① 贝蒂著,洪汉鼎译,《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选自阿斯特等著,洪汉鼎等译《诠释学经典文选》(上)(台北:桂冠图书,2002),第129—135页。

② 上引书,第137、138、161页。

决其时代问题的诠释立场、诠释模式与诠释内涵等；最后，诠释者自身则可在诠释的不断操作中，建立自身的生命体悟。

如是，本文便可对《老子》文本形成与注疏诠释的语言机制进行解析与描述，同时说明其意义与作用。以下详述之。

二、文本形成的语言机制：正言若反

《老子》一书提及了“正言若反”的文本形成机制。《老子·第七十八章》谓：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78)^①

这段文字以“正言若反”为结，所谓“正言若反”从字面上看即指真正正当、正确、正常的言论听起来或说起来好似错误不正确的负面言论，如“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故河注谓“人君能受国之垢浊者，若江海不逆小流，则能长保其社稷，为一国君主也。人君能引过自与，代民受不祥之殃，则可以王天下。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为反言”(78河)。^② 而最鲜明摄人的则是“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就一般人言，“刚”之所以为“刚”，因其胜“柔”；“强”之所以为“强”，因其胜“弱”，然文中举水之“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且“无以易之”，则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令人无言，故河注谓“水能怀山襄陵，磨铁消铜，莫能胜水而成功也”，更引“舌柔齿刚，齿先舌亡”(78河)助成其说。于是《老子》以反常的眼光理解世界，形成其“正言若反”的奇特论述。

就上述所言，“正言若反”便将形成“某非某”或“某若非某”的句式，以进行反

①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老子道德经注》(台北：华正书局，1992)，第七十八章，第187、188页。以后所引《老子》文本，皆据此书，故仅于句后以括号标示章次，不再另行标注。

②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93)，“任信第七十八”下注，第298页。以后所引《老子》河注，皆据此书，故仅于句后以括号标示章次，并加“河”字，不再另行标注。

向论述。“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实际上是在弱非弱与强非强或柔若非柔与刚若非刚的基础上成立的，而在今本《老子》中这类以反义词建立的论述极多。如“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颡，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⁴¹⁾、“大成若缺”⁽⁴⁵⁾、“大盈若冲”⁽⁴⁵⁾、“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⁴⁵⁾、“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²²⁾、“躁胜寒，静胜热”⁽⁴⁵⁾、“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⁴³⁾、“强大处下，柔弱处上”⁽⁷⁶⁾、“守柔曰强”⁽⁵²⁾、“物壮则老”⁽⁵⁵⁾、“正复为奇，善复为妖”⁽⁵⁸⁾、“大小多少，报怨以德”⁽⁶³⁾、“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⁶³⁾、“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⁶³⁾、“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³⁶⁾、“知其雄，守其雌”⁽²⁸⁾、“知其白，守其黑”⁽²⁸⁾、“知其荣，守其辱”⁽²⁸⁾、“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⁵²⁾、“可名于小”⁽³⁴⁾、“可名为大”⁽³⁴⁾、“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⁵⁶⁾与“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⁷⁾等句即是。

除了反义词外，《老子》还以种种其他变化全面地完成了“正言若反”的论述。如“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²⁴⁾、“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⁴⁷⁾与“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⁶³⁾、“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⁶⁹⁾等以“不”、“无”否定词所完成的论述；如“其出弥远，其知弥少”⁽⁴⁷⁾、“为者败之，执者失之”⁽²⁹⁾、“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⁸¹⁾等反常之再现认知所完成的论述。又如“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¹⁸⁾、“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¹⁹⁾与“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⁴⁶⁾等则以语文朴素的叙事功能完成了反向的论述。则是从语辞、认知到叙事，“正言若反”均为《老子》完成其论述。

在上述静态的分析归纳外，不同版本的比较还提供了一种动态变化的观察。特别是近年出土之郭店简本、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北大汉简本等，提供了战国中期、秦、汉代初期、汉代中期的版本参考，^①可以与传世本比较，而在动态变化上

① 甲本字形介于篆隶之间，文中未避汉高祖刘邦讳，故抄写年代或在刘邦登基前，即秦末汉初之际，而更可能抄于秦。乙本字形为隶，避“邦”字讳，而不避“盈”、“恒”字讳，故当抄于刘邦在位期。汉简本避讳不严，以同批出土物与字形估计，或在汉武帝前期。

为“正言若反”的语言机制在文本形成的作用上提供最佳的佐证。

首先是“正言若反”的操作机制为文本形塑提供了相当的自由与弹性。论述的字句与内容,可随需要改变,如简本甲简 1 与王本十九章前三句的变换即是: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巧弃利,盗贼亡有。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绝伪弃诈,民复孝慈。 ^①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19)

【简本】

【王本】

两段文字雷同,但绝弃对象的差异令人印象深刻:简本绝弃的是“智”、“辩”、“巧”、“利”、“伪”、“诈”,王本绝弃的是“圣”、“智”、“仁”、“义”、“巧”、“利”,除巧、利二者外余皆不同,陈鼓应据以检讨道家思想与仁义的关系。^②但从文本形成的规律来看,并无不同,简本“绝智弃辩”等三句形成了“绝某弃某”的规律,而为反省社会提供了一种表现方式,任何需要弃绝的虚伪观点都可用此论述,亦即形成规律本身允许不同的弃绝对象,可以不断衍生新句,是故简本“绝智弃辩”与“绝伪弃诈”可换成王本“绝圣弃智”与“绝仁弃义”。单句形成规律的变换弹性因而开放了文本内容,充实了“正言若反”的论述,反应了道家重视时变、与时迁移的特性。

而“正言若反”语言机制在文本形塑上还具有增生新句的功能。如王本五章较甲简 23 文增生了前后段,现较之如下: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欤?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
虚而不屈,	虚而不屈,

①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释文注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老子》甲,第111页。此下征引竹简《老子》除需特别讨论者外,皆据此本释文,不另注明。

② 陈鼓应,《先秦道家之礼观》,《汉学研究》第18卷第1期(2000年6月),第3、4页。

动而愈出。

动而愈出。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简本】

【王本】

相对于传统对仁的提倡、对言的重视，此处以“圣人不仁”、“多言数穷”等反言完成新增文本。有时比较各本变化之迹，还可观察到“正言若反”机制影响一章文字所形成的一个好似“精心制作”的过程。比较各本三十章，即可实际看出其间的变动过程。今对照如下：

以道佐人主者，
不欲以兵强于天下。

以道佐人主，
不以兵〔强于〕天下。
〔其事好还。
师之〕所居，
楚枋生之。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
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
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
必有凶年。

善者果而已，
不以取强。
果而弗伐，
果而弗骄，
果而弗矜，

是谓果而不强。
其事好。

善者果而已矣，
毋以取强焉。
果而毋骄，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毋得已居，
是谓〔果〕而不强。

善有果而已，
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勿骄，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物壮而老，
是谓之不道，
不道蚤已。

物壮则老，
是谓不道，
不道早已。

【简本】甲简 6 至 8

【帛甲本】三十

【王本】三十章

首先,帛甲本较简本强调了“道”的好还与长久,在并列关系下增加“师之所居,楚枋生之”以对比道之善好,令人振奋的雄壮军容在此成了负面的形象。再于“果”之平行句组中新生“果而毋得已居”一句,助长道“果而不强”的特性,最后再增加“物壮而老,是胃之不道,不道蚤已”一回环句组,使道“果而不强”的特性归结至道在时间上无限长久的功用,以与一般相反的意象运用“毋得已”与“壮”,完成新增句。而王本更在帛本之后继续顺理,先增“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一句,^①使道的善好彰显至极点,并与下接之“善有果”形成强烈的转接变换,再整齐“果”字句组的句式,提升重复并置关系的强度,扩展语义范畴。终则调整最后一段的节奏,将“物壮而老”的“而”字改为“则”字,增加句组之推移效果,以与其上平行句组突出对比,而使“不道早已”所隐含道不早已的时间延续感于认知中无限拉长。经此精制,今见王本三十章成了有主有从、有始有归、有转折有连续的完美一章。

经过上述分析可知“正言若反”便是《老子》文本形成的语言机制,且为深刻自觉的结果。故《老子·第一章》论道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

“道”不同于世俗常态下名言之认知,故“道”“非”“道”而“名”“非”“名”,常态运用语言下的“道”即是“道”与“名”即是“名”在此无效。而此“反”的态度并非肤浅的为反而反、到处乱反,乃具有深刻、坚固与充满意义的哲学基础,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人本应向自然之道学习,但现实中之人却与之背道而驰,故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77),于是才要“反”,从人为之路返回自然之道,是故又谓“反者,道之动”(40),破除一切人为语言、概念与行为常轨的执着与局限以求自然之无名,是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常无名”(32)、“道隐无名”(41),反向认知的态度得到智性确切的说明。再看《老子·第三十八章》论德亦然,其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38)

^① 劳健谓《汉书·严助传》淮南王上书云“臣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帛书老子校注》(高明撰,北京:中华书局,1996)第382页引之说明“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一句增入的来源,读者可参。

“上德不德”句中依然隐藏了“某非某”的句式，并在“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的反面论述中再次震荡与颠覆常人所认知的德。^① 故又于“不以智治国”的反向后置后结以“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⁶⁵⁾。^② 可知，“正言若反”的语言机制乃是从《老子》的道德论述中来，是以《老子》全本论述尽皆服膺，而成为其文本形成的语言机制。

三、文本阅读的语言机制：吾何以知/称出乎我

当“正言若反”的语言机制从作者面转向读者面时，隐藏其中的“称代”作用便将鲜活起来。即站在读者认知的立场细细观察，要理解“弱之胜强，柔之胜刚”除了要先打破自己对于“强”与“刚”的执着，放弃一般强胜弱与刚胜柔的认知外，还要在友善的合作态度下，引入自己的生活经验，如河上公以“水能怀山襄陵，磨铁消铜，莫能胜水而成功也”进行理解，而其他古人或可以滴水穿石完成理解，现代人则可以水刀切石或树根撑裂水泥的状况充实理解。换句话说，对于“若反”之“正言”的理解要经过两个步骤：先是放弃原先掌握的语义；然后在自己的认知理解下，将“弱”代入“强”，将“柔”代入“刚”，将“反”代入“正”，才算完成。先者是对原本语义的抽空，后者是将自己领悟的语义充入。则对于一个语词来说，若相反的语义都可充入，那还有什么不能充入？而早在王弼《老子指略》“名生乎彼，称出乎我”的论述中已然深刻地指出上述事实。

首先，王弼提出了“名”与“称”两种运用语言的方式。王弼谓：

① 按：刘福增曾批评严灵峰用甲是非甲的公式来解说老子“正言若反”不恰当，因为老子对反思想所讲到的东西非常杂多，不能一概而论，故而刘福增使用“对反”这个词汇。（参刘福增著《老子哲学新论》，台北：东大图书，1999，第29、32页）笔者在此所要澄清的是本文的旨趣乃在认知而不在逻辑，是以老子的语言属于什么逻辑或合不合逻辑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不合逻辑的语言仍能流传于社会而为广大的群众所认知，因此，本文关注的是老子语言的认知效果，就“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而言，其论述方式确实违背了一般语言常轨，而能在读者认知中形成某非某的反常效果，这种反常效果能使人们重新审视生活中已然习惯或僵化的常轨，而在实际生活中形成反省态度，达到反省功能，这才是本文所欲论述的目的。

② 按，古之所谓德具有处理事物的功能，如《国语·晋语八》“比德以赞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皆可证。《老子》“与物反”之“玄德”即指以反常态度处理事物之功能。

名也者，定彼者也；称也者，从谓者也。名生乎彼，称出乎我。故涉之乎无物而不由，则称之曰道；求之乎无妙而不出，则谓之曰玄。妙出乎玄，众由乎道。故“生之畜之”，不壅不塞，通物之性，道之谓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有德而无主，玄之德也。“玄”，谓之深者也；“道”，称之大者也。名号生乎形状，称谓出乎涉求。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虚出。故名号则大失其旨，称谓则未尽其极。是以谓玄则“玄之又玄”，称道则“域中有四大”也。^①

概论之，从物之“形状”着眼的言语是“名”，从言说之我着眼的言语是“称”。细说之，则就言说中之物我关系言，物是“彼”而我是“我”，两种言语方式之一的“名”乃是依据外在客观事物之“形状”所生，以便确认与分别外在实存事物，故谓“名生乎彼”、“名号生乎形状”、“名也者，定彼者也”；另一言语方式“称”乃由内在主观认定之“涉求”所生，是言说者“我”经过自己内在的衡量，确定当下语境中说此话语的意义，而后发出，故谓“称出乎我”、“称谓出乎涉求”、“称也者，从谓者也”。

而“名”与“称”此两种方式也将言者之精神世界导向相对的两端。一端不断以“名”去分别与固定外在之“彼”而成，言者因此认定世界乃由一众多具体客观事物组合而成的外在世界，“我”乃是世间序列存在的众物之一；另一端则因言者不断以“称”将其言说回归内在之“我”而成，言者以“我”为中心向外环视，透过“我”去理解与掌握万物的存在，每一事物的存在均是透过言说由“我”所出，所谓“万物并作”，乃是指“在吾人意识内在的舞台中，种种思想、念头，所见对象的兴起”^②。《庄子·齐物论》说得更直接，“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于是在“称”中，完成了一个透过言者“我”的存在谓之而成的论述世界。

显然，在王弼心中，《老子》的言说方式偏重于“称”。这自是基于“道”的特性所成，盖道乃“无形无名”，因“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是以“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

① 《王弼集校释》，第197—198页。

② 沈清松，《老子的知识论》，《哲学与文化》20卷1期，1993年1月，第103页。

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① 道既“无形无名”，是以只可称之不可名之，故又谓：

故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极，未足以府万物。是故叹之者不能尽乎斯美，咏之者不能畅乎斯弘。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赜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弥纶而不可极也；“远”也者，取乎绵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然则“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也。然弥纶无极，不可名细；微妙无形，不可名大。是以篇云：“字之曰道”，“谓之曰玄”，而不名也。^②

这根本是对《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¹⁾与“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²⁵⁾的说解。说解从论述对象与论述言语着眼，论述对象“无形无名”，而所赖以论述的语言则有分有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描述工具与描述对象二者特性不相符，是以“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故“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③ 于是本指道路的实词“道”成了一个虚空而可注入任何称谓的代词。

甚至于，在“称”的作用下，相异相反的“道”“物”二者亦可互相代入，从而完成“正言若反”的描述。这真是《老子》极为特别的表现，道与物二者因其相异相反，故而共同建立了中国思想主线，^④《老子》之中亦极多相类论述，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¹⁾、“道冲而用之或不

① 《王弼集校释》，第 195 页。

② 《王弼集校释》，第 195—196 页。

③ 《王弼集校释·老子道德经注》第一章“名可名，非常名”句下王注，第 1 页。以后所引《老子》王注，皆据此书，故仅于句后以括弧标示章次，并加“王”字，不再另行标注。

④ 陈鼓应，《论道与物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台大文史哲学报》第 62 期（2002 年 5 月），第 100 页；王邦雄，《老子的哲学·序论》（台北：东大图书，1986），“一、形而上与形而下”，第 2—5 页。